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

□钟燕林 陈安

百年芳华 峥嵘岁月
党史中的赣州

为进一步推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加强和改善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6月8日作出《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由林伯渠、梁柏台、谢觉哉等组成的大会筹备委员会。决议指出:“为了加强对全国革命的领导,使全国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伟大斗争开展新的局面,为了总结两年以来全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决定新的方针及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必须召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当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苏维埃中央政府特决定于广暴的6周年纪念日(1933年12月11日)在赤都瑞金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8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关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大纲》。8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出了《关于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通知,要求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准备选举并派送代表至中央苏区。此时,红一方面军已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中央苏区进入了鼎盛时期。中央苏区扩大到地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等省级和6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红军发展到12万多人,党员人数超过13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二苏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当年秋冬,中央苏区各省、县苏维埃政府进行了选举工作,先后召开省、县两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出席“二苏大会”代表。为召开“二苏大会”,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沙洲坝新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在叶坪建造红军烈士纪念馆、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和博生堡。然而,由于湘赣、湘鄂赣苏区的代表选举没有完成,加上蒋介石在9月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二苏大会”召开的时间推迟到1934年1月。

经过半年多的充分准备,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二苏大会”在瑞金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列席代表



“二苏大会”全体代表合影。(资料图片)

约1500人。开幕式当日清晨,在中央政府运动场举行了盛大阅兵典礼。迫于当时的严峻形势,“二苏大会”提前于2月1日闭幕。这次大会,总结了两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任务;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建设决议案》《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关于红军问题决议》《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以及《关于国旗、国徽、军旗的决定》等各种法令;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邓子恢等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罗荣桓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

“二苏大会”期间,阅兵典礼于开幕当日拂晓在瑞金沙洲坝中央运动场举行,毛泽东代表全苏区工农群众向红色战士致敬。大会给“在战争动员工作中有特殊功绩地方的工农群众及红色战士”发了奖章,其中有兴国模范县、瑞金县和红三军团等。毛泽东亲自给这些模范单位颁发奖章,并题写了“模范兴国”四个大字赠送给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大会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晚上有游艺、提灯庆祝晚会等。

2月2日,与会全体代表与当地群众数千人,在叶坪红军广场参加了红

军烈士纪念馆、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等纪念建筑的揭幕典礼。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项英、王稼祥、邓发、凯丰等领导人,为红军烈士纪念馆的题词,镌刻在纪念馆基座上,其中,毛泽东的题词是:“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的战斗中,许多同志光荣的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2月3日,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苏维埃组织法》,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主席、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及各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其中,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张闻天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为临时最高法院主席;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至此,“二苏大会”圆满完成各项任务,胜利结束。

“二苏大会”的成功召开,是中国



“二苏大会”主席团团章。(资料图片)

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重要思想,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的形成,为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二苏大会”关于苏维埃政权各项建设的决议,为中国苏维埃运动指明了方向,使工农群众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拯救中国于沦亡,使全中国民众得到彻底的解放”。

“二苏大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使中国共产党真正开启了治国理政的航程。

红色故事

邓振询

忠贞不渝,英勇斗争

□庄春贤

苏区时期,他一心扑在工人运动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成为手工业工人运动的领袖;抗日战争时期,他与人民同甘共苦,顽强地抗击日军的侵略,不幸英勇牺牲。他就是兴国籍革命烈士邓振询。

邓振询(又名邓仲铭、邓重民),1904年生于兴国长冈乡大塘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苦难的生活锻造了他坚强的性格。1926年,北伐军进驻江西后,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的兴国籍共产党员陈奇涵、胡灿、鄢日新等人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受他们的影响,邓振询毅然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塘石乡工会主席、上社区工会委员长。

1930年2月,兴国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县城明伦堂召开,大会选举成立了兴国县工会执行委员会,邓振询当选为兴国县总工会委员长。他深入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恢复了船筏、码头等行业工会。广大店员、手工业者、船筏码头工人踊跃参加工人纠察队,积极进行军事训练,有力地配合了红军攻打赣州、吉安军事行动。

1931年11月,邓振询光荣地被选为江西省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1932年2月,他率江西省工人代表团,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召开的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当选为江西省职工联合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不久,他担任江西工会委员会委员长,领导工人开展革命斗争,迫使资本家不得不遵守《劳动法》,使广大工人很快改善了工作和生活待遇。

在艰苦的斗争中,邓振询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32年底,他妻子被敌机炸死,他顾不上回家料理后事;儿子染患天花,他也没有抽时间回去看看。1933年5月,全总苏区执行局在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手工业工人代表大会,邓振询参加了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并被选为全国手工业工会委员长。从此,他就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踏踏实实工作,很快就成为中央苏区手工业工人运动的领袖。

1933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扩大红军突击月活动”的决议。邓振询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西岗(扩红)突击队出色完成“扩红”任务,受到党中央表扬,其本人也被评为“扩红”模范。1934年1月,他参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央颁发的奖章,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央政府劳动人民委员。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为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4年10月,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的邓振询,随中央红军主力参加长征。每到一地,他都积极向群众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动员群众为部队提供粮食等必需给养,出色地完成了地方工作部的各项任务。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劳动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兼工农厅长等职。

1938年初,邓振询受党中央派遣回到南方,任江西省委运部部长。为了做好新四军的集中改编,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邓振询到赣南、闽西、湘粤赣边、湘赣边等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月底,他抵达龙岩后,协助邓子恢、张鼎丞等完成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组建工作。是年春夏,新四军第一、二支队主力挺进苏南,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1月,邓振询到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领导扩军运动,组织群众抗日,有力配合和支援新四军抗击日军的进攻。1940年2月,邓振询被派往苏南,先后任苏皖区党委书记、江南军政党委书记。他积极协助陈毅、粟裕等同志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新四军挺进苏北抗日前沿的桥梁。

1940年冬,日军出动三四千兵力,对舟北、茅山、江宁、句容等地区持续了6个月的反复“扫荡”。邓振询与苏南人民生死与共、患难相依,进行了气壮河山、义薄云天的英勇战斗,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及日军、伪军对苏南根据地的夹击。

1942年一二月间,在中共中央华中局扩大会议上,邓振询翔实介绍了苏南各项政策和工作情况,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好评。8月,他调华中局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他先任华中局民运部长,年底转任中共苏皖区党委副书记。

1943年3月,邓振询重返苏南工作,任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这时,蒋介石又掀起反共浪潮,邓振询领导苏南军民进行自卫反击。8月3日黄昏,电闪雷鸣,大雨纷飞,部队在江宁冯庄住宿,发现敌情,当晚转移,在高桥渡口渡秦淮河时,邓振询不幸为革命殉难,时年39岁。

他牺牲后,江宁县军民在周岗禄杨头村举行了追悼大会,有副对联写道:“昔奔革命,今奔革命,中国共产党功德伟大;生为大众,死为大众,苏南邓主任精神不死。”

1944年8月,在隆重悼念邓振询烈士大会上,江渭清代表苏皖区党委再次高度评价道,他“尽瘁中国革命,十年有余,领导苏南斗争时逾三载,而其对党与革命无限忠诚……实为全国人民及全体共产党员之模范”。

“妈妈的马灯”点亮长征路

在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陈列着一盏马灯,它虽然锈迹斑斑,却记载着87年前一位母亲等待8个参加长征的儿子归来的故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大转移,开始了漫漫长征。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跋涉千山万水,历经血水洗礼。15年后,他们托起一个巍然屹立的崭新中国。当年,千千万万苏区好青年踊跃参加红军,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在苏区大地上,上演一幕幕妻送郎、母送子当红军的动人情景。

于都县银坑镇窑前村农妇钟招子有10个儿子,8个当了红军。1934年10月,8个儿子同时从家乡于都出发,跟着队伍走了,只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分别时,钟招子含着泪对儿子们说:“一定要多打胜仗,妈等你们回来,一定要回来……”

由于丈夫早逝,钟招子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回家做家务。自从儿子们参军后,每到夜晚,她就坐到老屋门前,点起一盏马灯,等着儿子们回来。等着、等着,钟招子头发白了;

等着、等着,钟招子腰板驼了;等着、等着……这一等就是十几年,眼泪流干了,眼睛哭瞎了,她也没等到一个儿子回来。

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于都。钟招子守候在队伍的必经之路上,整整三天三夜,一次次地询问,有没有人看见她的儿子,有没有人知道她儿子的音信,可是没有人知道。后来,每天夜晚,她依然点亮马灯,坐在石阶上等着儿子。她说:“我眼睛看不见了,但马灯不能灭啊,灯灭了,儿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她希望用微弱的灯光,照亮儿

子们回家的路,也让他们看清妈妈的样子。可她北上的儿子们还是没有回来。再后来,她和两个儿子一起,在村后竹篙岭的大树下,修了一座坟。每逢清明,她便带着全家来祭奠。

如今,祭奠依旧继续着,只是在原来的坟边又多了一座坟——钟招子在那里永远地安息了。1960年,她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离开时,她留下一句话:“把我埋在我儿的身边。”她是多么盼望,她的儿子能回来……

(肖婷婷 记者刘庆元 整理)

用于反腐倡廉的第一个控告箱

近日,在兴国县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记者看到,在馆内陈列着一个小木箱,它与现在随处可见的家用报箱相差无几。兴国县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讲解员刘娟告诉记者,这个小木箱是中国共产党用于反腐倡廉的第一个控告箱(仿件),也是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缩影,小木箱的原物现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据介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下设多个部门,中央工农检查部便是其中之一,该部下设控告局。同年,工农检查部控告局将这个机关自制的控告箱挂在了兴国县高兴区苏维埃政府。

“设立控告箱是工农检查部大打贪反腐的具体体现之一。事实上,工农检查部一直非常重视通过检举来发现贪污腐败行为。通过在控告箱的右面、左面、上面用毛笔写满的小字,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苏区反腐的细节。”刘娟介绍说。

控告箱右面的小字:“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这充分说明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设立控告箱的初衷。

控告箱的左侧写有举报的原则:“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实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

人住址,同时要将被控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处理。倘若发现挟嫌造谣控告事,一经查出,即递交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控告箱的上面写着举报办法:“各位工农群众,一切事情都可以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盖好私章才能作效,没有私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查部控告局收。”

刘娟告诉记者,这个控告箱在兴国县高兴区苏维埃政府一直挂了3

年多,见证了中央苏区苏维埃反腐败斗争的历程。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这个控告箱一直被当地百姓保存着。我们如今已无从得知当年百姓是怎样保存它的,但我们可以想象,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保存它要冒着怎样的风险!一个小小的控告箱之所以如此深得普通民众的心,是因为它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监督机制,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有力举措。

(毛飘洋 记者刘水莲 整理)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